



翰林外史

一个时代的怀念

——何旭初先生九十周岁祭

丁玖

2002年5月20日我回母校南京大学参加100周年校庆活动。此前几天，我还在北京学术访问。一天下午，在住所等待一位访客之时，我突然感到有一股激情在胸中澎湃，因为我想起了已经去世十二年的导师何旭初先生。当日，我一气呵成写下了散文《纪念何旭初先生》，并于第二天传真到南京《扬子晚报》编辑部。校庆第三天，一位家乡好友致电说看到了当天报纸上刊登的这篇文章。不久，该文又被收入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汇编。当大学同班同学、南大数学教授何炳生特地送我这本有收藏价值的书时，我高兴万分地收下这一意味深长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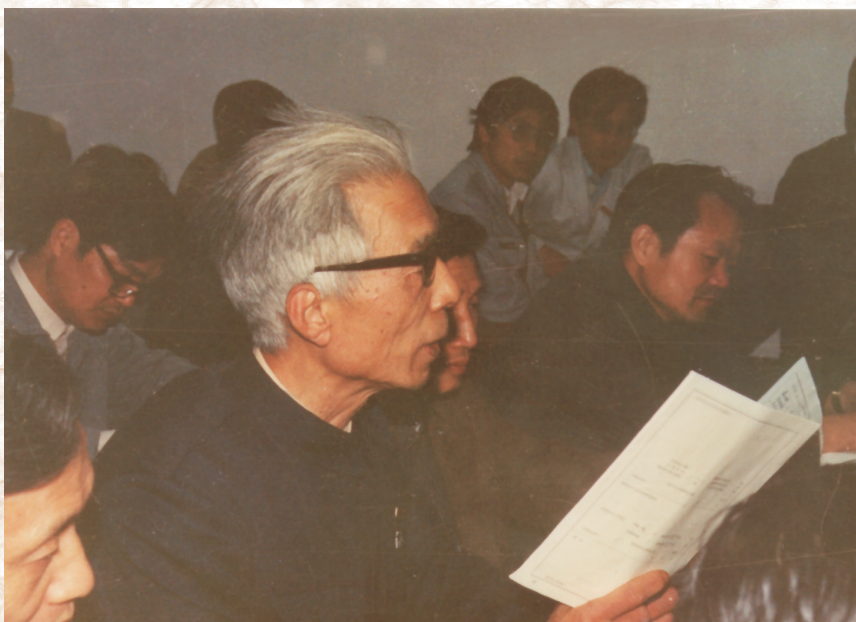
今年是何先生九十周年华诞。我感到有一股新的激

情要写下第二篇短文纪念他。这不光是怀念其躯体早已不在人间的一位教授——当年的中国计算数学界“数值代数与最优化”领域的领袖之一，更是怀念其精神已经部分逝去的一个可与“西南联大”时期媲美的年代。

1990年四月底的一个深夜，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这是我南大同学尹光炎从他读书的美国犹他大学处打来的。在电话中他转告了何旭初先生当日病逝的噩耗。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悲伤之情难以言表。我以最快的动作告知了在海外的我们那几届南大数学系毕业生，很快就征集到大约十六位同学的唁电签名，传真到母校数学系，表达了我



何旭初 (1921-1990)



1987年5月7日,何旭初在他第一个博士生赵金熙的论文答辩会上

们南大海外学子的深深哀悼之情。后来听说,这封唁电在何先生的追悼会上感动了在场的老师们。

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我们四位同学,王思运、倪勤、钱迈健和我,考取了何先生的“最优化”专业读硕士学位。我读本科时颇为爱恋“泛函分析”,曾考虑过报考纯粹数学的这个方向,但一位计算机系的老师鼓励我报考何先生的专业,并告诉我说这是南大在国内高校“傲视群雄”的学科之一。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何先生,对他研究的专业也一无所知,但我相信这位关心我成长的外系老师,就这样和其他三人成了何先生的研究生。

两年半的求学阶段,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导师。从第一个学期起,何先生就和我们融合在“讨论班”之中。他一开始就为我们编辑了一大册本专业历史上最有名的论文,让我们很快就遨游在原始思想的海洋里。读书是争分夺秒的、讨论是激发灵感的、情绪是自由快乐的。在我们的印象中,先生的面容“严肃认真”居多,偶尔也会“宛然一笑”,但从来没有对我们来过一次厉声呵斥,因为他对我们青年学生有一颗慈父般的心肠。拿到硕士学位时,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和过去判若两人,从学问,到做人,深深地受到他的影响,被他潜移默化。因此,我们更加热爱导师。

1986年赴美后,我一直和何先生保持通信联系,直至他69岁时因患上不治之症而离开人世。他的回信我一直保存完好,也许是我日后“激情荡漾”地撰写“一个时代的回忆”时有意义的资料之一。最近,我再一次阅

读了先生的来信,倍感亲切。他那苍劲的、在老一辈“文理并茂”的学者手下常见的笔锋中,我读到的是谆谆教导、殷切希望、师生之情、未来展望。当时的我,就仿佛看到万里以外的先生严肃的外表内蕴藏的热忱、紧锁的浓眉下欣慰的笑容。

我最先知道何先生因癌症晚期入住江苏省人民医院是他去世前几个月从何炳生的来信中得知的。当时他被瞒着贲门癌的真相,只被告知是老生常谈的胃病困扰,但同事们都伤心地知道他来日无多了。我也悲伤不已。那是我博士论文快要完成的时刻,由于当时若回国返美签证困难,我能做到的只是在寄去问候的同时也寄了点钱给他,并委托住在扬州的家兄前去代我探望。家兄的回信用散文笔法详细描绘了何先生的欣喜之情,因为先生一眼就认出可能是世界上长相与我误差最小的家兄,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的昔日弟子就站在跟前。

何先生逝世后三个半月,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他再也无法听到我向他报告这一喜讯,我再也读不到他笔下流出的勉励之语,再也看不到他慈祥面孔的音容笑貌。二十一年一下子过去了,每当我回到母校,无论是同学相聚,还是学术交流,眼睛里时时浮现出当年我很熟悉的满头白发的他那瘦削、笔直的躯体在雨中撑着伞,从系里独自走回家时的背影;耳朵旁常常回响起多年前去他住处聆听教诲时,脚步下破旧楼梯的吱喳声。如今,物质上安于清贫,精神上追求富有的那些可敬的故人、那个迷人的时代正在离我们越走越远,但留给我们记忆



作者的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合照（摄于1981年底）。第一排左一为颜起居老师，右二为陈瑞珠老师，右四为包雪松老师，右七为周伯坝教授，右十为叶彦谦教授；第二排右二为邱增煌老师；第四排右四为何炳生教授；第三排右三为作者

深处的亲切感却难以在脑海中抹去。他们平凡而感人的故事也许会令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大吃一惊的。

我记得当年教我们最重要基础课《数学分析》的颜起居老师。他是何等的认真、何等的负责，一板一眼地反复训练我们大要“ $\epsilon - \delta$ ”之极限语言这把“程咬金的大斧头”。他耐心传授的这一套基本武功让我们无论干什么职业都受益无穷，终生不废。不幸的是，本文初稿刚写完一周后的4月25日，中风多年、不到75岁的颜老师悄悄地离开了人间。我也记得类似于何先生那样瘦高的林成森老师。在隆冬的季节教授我们《线性代数》时，他身披着藏青色的破棉袄，脖子上绕了两圈的旧围巾，但那十分清晰的讲解，抑扬顿挫的语调，像巨大磁铁一般地把我们的好奇目光一下子从他破旧的穿戴上猛地拽到他充满智慧的双眼前。

我记得我们特别尊敬的专业主任苏煜城教授。这位留苏博士是我们扬州人的骄傲。他站在《偏微分方程数值解》课的讲台上，就像是运筹于帷幄之中的元帅，讲

解与板书一样从容不迫、行云流水，满腹的知识在他的嘴边结晶成艺术，听他上课真正是享受数学之美妙。但是，长期体弱的苏先生在课堂上“周期性”地不时上提裤腰带，那是因为身体有病皮带不能系紧之故，成为课堂美景中的一道小小风景线，更提升了所有的学生对他的敬佩。我也记得严格得令学生们害怕得“发抖”的王巧玲老师。虽然长相和身高都像个“小女孩子”，演示数学时只写黑板的下半部分，但当神色威严的她一旦接手指导我们的《数学分析》习题课，就把“自以为得意”的一些同学将了一军，大挂黑板，包括现已成长为中国“数学王子”的她的亲密女同事之子。

我记得不摆架子、从不发火的何泽霖老师。他除了率领我们进入《复变函数》像“人造虚数”那样的奇妙仙境，后来那和风细雨式的兼职研究生思想工作也让我们如沐春风。面对这个青年导师，你可以为自己的心扉和盘托出而满心喜悦。我也记得本科时代的辅导员邱增煌老师。他大概是最能和大学生打成一片的“政治委员”，因为



左图为作者和王巧玲老师，右图为作者和苏煜城教授。2002年5月20日南大100周年校庆时摄于校园

他就好像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除了我们叫他“邱老师”而不会叫他“老邱”或直呼其名，尽管他的年龄比我们最老的同学还要小点。

还有活泼可亲的包雪松先生。她与何先生、苏先生合著的《计算数学简明教程》精炼明了，脍炙人口。我出国前和何先生告别时，他亲手送我这本教材。不久前刚刚驾鹤西去的徐鸿义老师，性格温文尔雅、教书一丝不苟，高度近视的他正像一位徐悲鸿少年时代认认真真的江南私塾先生。面肤白皙、目光炯炯的吴启光老师漂亮的粉笔字和他讲的《偏微分方程》一样漂亮，字正腔圆的表演更令课堂生辉。他的太太陈瑞珠老师爽朗的笑声和不厌其烦的态度，让在其指导下毕业实践的我们深受感染，忘记了算题的繁琐和辛苦。

难以忘记我们的先后两任系主任：高大的叶彦谦先生和瘦小的周伯坝先生。我们当年最爱不释手、几乎人手一册的参考书费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第一卷第一分册中译本就出于五十年代叶先生的手笔。我读大学前在工厂学徒时就见过周先生在“大跃进”热潮中专门为工农大众写的厚书《代数浅说》。他们的弟子们现在遍及全世界，但是他们也像何先生一样，已在另一个世界里遥望着我们。

“吃水不忘掘井人”。没有这些孜孜不倦、任劳任怨的教书育人者，没有他们的那份敬业精神，没有他们的那种忘我态度，哪有我们的今日事业？他们也写著作，也做研究，但是他们把培养学生作为己任，而不仅仅把培养“论文”作为己任。他们高尚的职业道德，让我们仰慕不止。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研究生实在是太幸运了，

因为那个时代的老师是良师，也是益友，是韩愈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真正履行者，是教育园地名副其实的辛勤园丁。那个久远的年代，正因他们的无私奉献而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记下骄傲的一页。

多年来，何旭初先生的弟子们一直都在怀念他。十二年前的1999年，他的博士生、也是我的老师之一的孙文瑜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上组织了一个纪念何先生的特别分会，何炳生教授的德国博士导师 J. Stoer 教授也出席了，并高度赞扬这一活动。今年的5月底在南京师范大学，我们将以学术交流的方式庆祝何旭初先生的九十冥诞。届时我将首次出示恰好四分之一世纪前何先生写给我的第一封回信。这会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呀，毕竟，这一页信纸的字里行间，折射出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那个时代的特点。

2011年4月17日初稿，2011年5月3日完稿